

# 论曾国藩的人才观

## ——兼析曾胜洪败之因

郑云山

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在经过 14 年激烈搏斗后,终于悲壮地失败了。与太平天国对垒的敌人,有中外各种反动势力,而其中在战场上充当主力的,则是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因此可以说:太平天国与各种敌对势力之间的生死搏斗,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洪秀全与曾国藩之间的较量,是由他们分别代表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革命与反革命之间所进行的大较量。关于曾国藩之所以终于胜利、太平天国之所以最终失败的原因,人们早已作过广泛深入的研究,一些基本问题亦已有了定论。本文则拟从人才观这个角度,即从迄今尚少专文详论的曾国藩与洪秀全对待人才的不同态度,来谈论曾国藩之所以最终战胜了洪秀全的原因。

—

中国近代史上这场重大较量的结局之所以是湘军胜了太平军,即曾国藩胜了洪秀全,有着大家公认的一些基本原因,诸如曾国藩所属于和所代表的中国封建势力早已有根深蒂固的深厚基础,又得到外国资本主义侵华势力的支持;而太平天国作为单纯农民战争又存在着缺少科学理论与纲领之类不可避免的弱点,等等。但仅此并不必然要以曾胜洪败为结局。历史上农民大起义打垮对手、推翻旧王朝的事并不罕见,尽管从胜利了的农民起义最终也只能建立新的封建王朝而论,农民起义总是逃不脱失败的命运,但那终究是与半途被旧王朝淹没于血泊中不同的另一类失败。至于太平天国起义发生在中国已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历史时期,因而它与以往历次农民起义不同,不仅要对付本国封建主义,还要面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敌视,这当然加重了太平天国的困难,加速了它的失败,正如洪仁玕临终前夕沉痛地说过的:

“我朝祸害之源,即洋人助妖之事”,“如洋人不助敌军,则吾人断可长久支持。”<sup>①</sup>特别是在 1860 年之后,英法等外国侵略势力在江浙一带组织“洋枪队”,甚至出动驻军,公然帮助清朝攻打太平军,大大加速了太平天国的最终失败。但我们综览太平天国全史,它毕竟主要是由本国封建势力,而在战场上则主要是由湘军镇压的;外国侵略势力的武力干涉所起的作用,是加速了太平天国的失败,而不是使太平天国由胜利转为失败。所以,太平天国起义之所以未能象历史上有的农民起义那样终于推倒旧王朝,实行“改朝换代”,而是被中途淹没于血泊之中,还应当从斗争双方的主要人物的素质、政策等方面去分析具体原因。

曾国藩与洪秀全的较量始于 1853 年。当时曾国藩所处的地位尚不及洪秀全之有利;曾国藩在军事才干上也并非都强于洪秀

<sup>①</sup> 《洪仁玕自述》,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二),第 853 页。

全。

1853年1月曾国藩开始筹建湘军时,太平天国已成燎原之势。而他作为在籍侍郎、帮办团练大臣,对湖南当地既无财权也无行政权,且经常要受到湖南一些地方官和绿营官兵刁难排挤,每办一事都困难重重:“当是时,势力既不行于川县,号令更难信于绅民,盖不特筹饷筹防,事事掣肘已也。”<sup>①</sup>虽然他是在为保卫清朝封建统治尽力卖命,但那时他还远未得到清政府的大力支持,他办事远不如洪秀全在其自己辖区内的得心应手。清政府对曾国藩的全力支持,要到1860年“江南大营”被太平军歼灭以后;而此时太平天国表面虽仍声势浩大,事实上太平军与湘军之间经多年的决斗,已明显地处于被动态势,曾胜洪败的结局已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了。

在军事才干上,曾国藩有规划战略、布置全局的不凡本领,这是洪秀全不及的。但在指挥具体战役上,曾国藩似尚不及多少指挥过几次胜仗的洪秀全,肯定还不及许多太平军或湘军的将领。他亲自直接指挥的战役,从1854年湘军初出茅庐时的靖港之役起,几乎总是打败仗,以至后来凡是湘军与太平军进行重大恶战时,曾国藩都特地避免亲临前线指挥。如1860-1861年空前激烈、残酷的安庆争夺战期间,他硬是不去安庆前线,他说因为:“历年以来,凡围攻最要紧之处,余亲身到场,每至挫失,屡试屡验。……此次余决不至安庆,盖职是故。”<sup>②</sup>连1863-1864年湘军围攻天京的最后殊死较量期间,曾国藩也坚持不赴前敌,直至湘军打下天京,他才急舟前往布置善后。曾国藩被人称为“具知人之明”,<sup>③</sup>看来他也不乏自知之明,他自知缺乏指挥战役本领而抱定宗旨不直接插手具体的指挥。对于曾国藩不善指挥战役,他的好友王闿运也直言不讳:“曾国藩首建义旗,终成大功,未尝自以为知兵,其所自负独在教练,”并把曾国藩与其部下作了有趣的比较:“曾国藩以‘惧’教士,以‘慎’行军,用将则胜,自将

则败;杨岳斌、鲍超以‘无惧’为勇,以‘戒惧’为怯,自将则胜,用将则败。”<sup>④</sup>所谓“自将”就是亲自直接指挥战役,这是曾国藩的短处;所谓“用将”就是使用人才,“用将则胜”是他的长处。

可见,当曾国藩开始与洪秀全较量时,他并不处于比洪有利的地位,他也并无指挥战役的才干,那么何以这场较量终于曾胜洪败呢?太平天国名将石达开对此作过这样的概括:曾国藩“虽不以善战名,而能识拔贤将,规画精严。”<sup>⑤</sup>所谓“规画精严”是指曾国藩在战略布置上的长处,本文姑不论列;而“识拔贤将”则与王闿运说的“用将则胜”同一个意思,就是指曾国藩在重视、识拔、培育、善任人才方面的高明。石达开的话言简意赅。薛福成作为曾国藩的门生与幕僚,对曾国藩在重视人才方面有更具体的评述,他说曾国藩之所以能最后成功“大业”,“非独其规恢之宏阔也,盖其致力延揽(人才),广包兼容,持之有恒,而御之有本。以是知人之鉴,为世所宗,而幕府宾僚,尤极一时之盛云”。<sup>⑥</sup>

## 二

薛福成说曾国藩的“知人之鉴,为世所宗,而幕府宾僚,尤极一时之盛”,并不是他对曾国藩的溢美夸张。人们无论对曾国藩是褒是贬,有一点却是都承认的:曾国藩一生极重人才,他在识拔、培育人才上有许多真知灼见和切实行动,这正是他作为个人,能“功成名就”的一个主要原因。

① 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第4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②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692页,岳麓书社1985年版。

③ 李鼎芳编《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第2页,岳麓书社1985年版。

④ 王闿运《湘军志》,第159-161页,岳麓书社1983年版。

⑤ 《薛福成选集》,第277页。

⑥ 同上,第213页。

曾国藩关于人才问题的言论中,给人以强烈印象的,首先是他始终把人才视作重于一切的财富,把人才问题放到关系国家兴衰、事业成败的战略地位上。例如早在道光末年任京官时,他就向多年来很器重自己的道光帝郑重进言:“窃维用人、行政,二者自古皆相提并论。独到我朝,则凡百庶政,皆已著有成宪,既备既详,未可轻议。今日所当讲求者,惟在用人一端耳。”<sup>①</sup>

“用人”就是指人才问题,曾国藩这里说自古以来与“用人”相提并论,即同为两大要政之一的“行政”,在清朝已完备无缺而不必再“轻议”,不用多变更,显然并非是他的由衷之言,他是个关心时势、讲求经世致用的人,清朝那些行之已二百年的祖宗“成宪”,大都早已不能适应中国的形势,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的新局势,他是看得很清楚的,他在别的场合经常抨击时弊,主张变更成法。但他向道光皇帝进言时却强调中国当前的问题“惟在用人一端耳”,就是要皇上把人才问题作为压倒一切的最大问题予以充分重视,这同时也正是反映了曾国藩自己人才重于一切的真切认识,因而尽管清朝百弊丛集,而他首先忧虑和强调的是人才问题。他看到那时“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颀预”,<sup>②</sup>认为这是国家最严重的问题。为了引起道光充分重视,才极言这是当时中国唯一的大问题,别的事皆可暂时放一下,唯独此事不可须臾漠然视之。

象历代重才者一样,曾国藩所理想的人才是德才兼备的。他曾以源与波、根与叶比喻两者之关系:“德与才不可偏重,譬之于水,德在润下,才即其载物溉田之用;譬之于木,德在曲直,才即其舟楫栋梁之用。德若水之源,才即其波澜;德若木之根,才即其枝叶。”<sup>③</sup>不过,当德才难以兼备时,曾国藩强调的首先必须有“德”,宁要有德无才,而不要有才无德的人。曾国藩心目中的“德”含义很

广,忠诚、勤俭、朴实、耿介、不怕死等等都是。具体而言,就是政治上忠于自己的信仰与事业,能心甘情愿地为之尽心尽力;作风上质朴实在,能吃苦耐劳;精神上坚韧不拔、顽强不屈,等等,他把具备这些品德的人称为“血性男子”,推崇备至。不同阶级对“德”有不同的要求,作为封建统治集团的一员,曾国藩自是按封建伦理和价值标准来规范、要求“德”的具体内含的,湘军多用死心塌地保卫封建道统的儒生为高级军官,其下级官佐与士兵则是只用乡下农夫而不用城镇市民,多用朴实少心窍和有“乡气”之人而不用带油滑气和“官气”之人,这些都是由曾国藩对“德”的要求所决定的。

有必要指出的是,虽然曾国藩刻骨仇恨太平天国,以大量残杀太平天国革命官兵为“痛快”,但他有时对那些特别顽强不屈的太平军将领又深表敬佩。林启荣 1854 年率太平军镇守九江,在此后四年中,与进犯九江的湘军进行了无数次激战,屡败湘军,即使在天京变乱后的极端困难情况下,也毫不动摇地与敌顽强拼搏,表现了对自己所服务的太平天国的无限忠诚。对这样一位令曾国藩十分头痛的顽敌,他却对其友人说:“九江竟尚未克,林启荣之坚忍,良不可及,但惜作贼耳。”<sup>④</sup>虽诬林氏参加太平天国是“作贼”,但对其敬佩之情溢于言表。对刘玲琳、李秀成等太平天国名将,曾国藩亦不只一次地表示过类似的敬佩之情。一方面是视作不共戴天的仇敌,必欲灭之而后快;另一方面又隐怀敬佩之心,——曾国藩对某些太平天国名将的这种矛盾心态,正是从他对“德”的要求中引发

① 《曾国藩全集·奏稿》(一),第 6 页,岳麓书社 1987 年版。

② 《曾国藩全集·奏稿》(一),第 7 页。

③ 《曾国藩全集·诗文》,第 390 页,岳麓出版 1986 年版。

④ 《曾国藩全集·书信》(一),第 614 页,岳麓书社 1990 年版。

的:从根本的政治立场上说,他与这些将领们所服务于和忠诚于的太平天国势不两立,但从能坚定不移地忠于自己的信仰和事业,为之甘洒热血,至死不屈地斗争而言,他又由衷敬佩自己这些敌人的品德;而他这样做,又是对自己部属的一种无言的忠诚教育。

曾国藩是封建统治集团中一个有强烈历史使命感的人,他既认识到人才问题是关系国家、民族兴衰的首要问题,又看到中国当时严重缺乏人才的现状,因而立志“以转移风欲陶铸一世人才为己任”,<sup>①</sup>

他不仅先后向道光帝和咸丰帝多次上奏,请求重视人才,而且他自己终生都十分重视人才的识拔、培养、使用。

在识拔、培养和任用人才上,曾国藩提出了“取之欲广,用之欲慎”的方针,并认真地遵此予以实践。“取之欲广”主要是指积极、主动地大力招引多种有用之才。他平时很留心人才信息,把听到和接触到的各类人才随时予以记录,有的记入日记,有的记入专册。例如后来成为湘军名将的刘松山,曾国藩在咸丰八年九月初次直接接触、交谈后,立即记入日记,记下刘松山的一些基本情况,并且记下自己对刘氏“挺拔明白”之类印象,准备加以提拔。<sup>②</sup>

当确知某地有理想的人才时,曾国藩会立即行动,尽力延揽。他认为“求人之道,须如白圭之治生,如鹰隼之击物,不得不休。”<sup>③</sup>薛福成的入幕便是一个典型事例。1865年,曾国藩奉命从南京北上直鲁“剿捻”,在苏北宝应舟次,他收到时年27岁的副贡生薛福成的《上曾侯相书》。该上书洋洋万言,提出了有关军事、吏治、经济、人才等广泛而富有创意的建议。曾国藩读后十分惊叹,“嘉赏无已”<sup>④</sup>立即派人邀薛氏入幕。事后,曾国藩对人说:“吾此行得一学人,他日当有造就。”<sup>⑤</sup>薛从此追随曾国藩八年,真至曾氏去世。他后来在学问、事业上确很有“造就”,证明曾国藩确有一双识才的慧眼。

为了广泛罗致人才,曾国藩还力倡互相引荐。他自己经常主动向别人推荐人才,如咸丰三年十一月,他向新任皖抚江忠源推荐安徽士绅、官员11人,向湘抚骆秉章推荐成名标、陈鉴源、周凤山、胡淑均等人才,向部属刘蓉推荐邹伯翰等“三邹”,等等。他也经常要求别人向自己推荐人才,有时甚至“广告各地,求荐才以辅我不逮。”而对于别人所推荐之人,曾国藩大都能认真对待,量才任用。如1864年夏,有人向他推荐桐城派古文学家吴汝纶的一篇文章,他阅后击节赞赏。直到次年吴氏进士及第、告假出京,曾国藩仍不忘招请他入幕。这年吴氏还只26岁,他来到徐州,投入曾国藩的幕府,以后也随曾多年,并受到曾国藩的器重与信任。

为了“取之欲广”,曾国藩能在识拔人才上打破资格限制,把具有真才实学而又被他看作品德好的人,破格提拔担当重任,湘军中一些重要战将就是由他破格提拔上来的。如分统湘军内外湖水师的杨载福、彭玉麟,就是曾国藩1853年下半年在衡州练兵期间,分别从行伍和禀生中识拔上来的。他们二人都富有军事才能,且一个是“智胆超群,秉性忠直”又“口不言功”;<sup>⑥</sup>一个是“任事勇敢,励志清苦,实有烈士之风”,<sup>⑦</sup>都很符合曾国藩对“德”的要求,故曾国藩把他们从无名之辈提拔到统领水师的高位上。而他们二人后来在建立、发展湘军水师,指挥湘军水师作战上,也确都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另一个湘军大将塔齐布也有类似情况。1853年曾国藩在

① 罗尔纲《湘军兵志》,第156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② 《曾国藩全集·日记》(一),第298页,岳麓书社,1987年版。

③ 《曾国藩全集·书信》(二),第1506页。

④ 《曾国藩全集·日记》(二),第1147页。

⑤ 《薛福成选集》,第27页。

⑥ 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三册,第352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

⑦ 《曾国藩全集·奏稿》(二),第1164页。

长沙开始练湘军时,塔齐布还只是个绿营守备,旋升用游击署参将,率兵与湘军一起操练。曾国藩每次见他早早到场,“执旗指挥,虽甚雨,矗立无惰容”,且塔氏善能团结士卒,因此便奏请予以破格超擢,清廷即授塔齐布以副将衔。由于塔齐布是旗人,故有人以为这是曾国藩讨好清廷之举。曾国藩讨好清廷之意或有之,但问题是他在奏荐塔齐布时是立下军令状的:若塔齐布以后“有临阵退缩之事,即将微臣一并治罪。”<sup>①</sup>那时湘军尚未练成,曾国藩还真的是“微臣”,如不是他极重人才和看准塔齐布之德才可靠,岂肯轻率地把自己的前途主动与塔氏系到一块?事实上,塔齐布后来在湘潭之战、岳州之战、小池口之战和武昌之战等湘军前期几次最大的恶战中,都表现了出众的勇敢,尤其在被称为“湘军初兴第一奇捷”的湘潭之战中立了大功而被提升为提督。<sup>②</sup>而湘潭之战在很大程度上是关系到湘军能否崛起的一次关键战役。

所谓“用之欲慎”,主要是指把各种人才招致以后,经常予以教育、培养,并安置到恰当的岗位上,充分发挥其所长。曾国藩认为对人才要有个或长或短的“访察”即考察过程,以辨其贤否、真伪,然后“权其材智长短器使之,聪俊愿恣,各尽其用,人无弃材。”<sup>③</sup>所以,除了一些直接破格超擢授以重任者外,曾国藩一般是将所罗致的人才先安置到自己的幕府即大本营内,让他们办理文稿、充当参谋等,使他们得到实际工作的锻炼,增长才干,取得办事经验,同时对他们进行经常性的品德教育与熏陶。他对部属进行教育、培养、熏陶的原则是“用恩莫如仁,用威莫如礼”。<sup>④</sup>所谓“用仁”,就是视部属如子弟,教育其努力上进,帮助其成才、发迹;所谓“用礼”,则是指对部属恪守礼法,持之以敬,临之以庄,保持尊严和得体,避免言行举止的失态。这种熏陶、教育、培养,既有他以自己日常生活中一举一动的无言表率来潜移默化,也有他对部属们进行经常性的训话、交谈和约束加以陶

铸。通过一段时间这样的教育、培养和锻炼,把他们造就成才,并伺机荐任合适之职。如李鸿章就在曾国藩幕府中受过较长时间锻炼、培育,于1861年由曾国藩奏荐其“劲气内敛,才大心细”,可任江苏巡抚,而在次年被清廷正式授职苏抚,从此发迹,成为清末最有权势的封疆大吏之一。<sup>⑤</sup>

由于始终充分重视人才,广为招引,悉心培育,因此,曾国藩延揽和造就了大批文武人才。据容闳1863年时在安庆所见,曾国藩幕府里除有大批军事人才外,还聚集着各类文职人才,“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等专门家,无不毕集,几于举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sup>⑥</sup>薛福成则算出先后入过曾国藩幕府、受过其培养熏陶而成大器的人物有83人之多。<sup>⑦</sup>

### 三

曾国藩是如此重视人才,求才若渴,采取切实措施广招人才,培育和提拔人才,而反观洪秀全,笔者未见他究竟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人才观和求才、育才措施。

太平天国起义后,也在军兴之地张榜招贤或开科取士,但应考寥寥,并未罗致到杰出之士。张榜招贤这类做法当然也应肯定,但与曾国藩那种明确地把人才放到决定一切的战略高度,因而“如鹰隼之击物”般力加延揽,不得不休的认识与做法相比,毕竟是大为逊色的。

太平天国前期的杰出人物为杨秀清、肖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秦日昌等人,几乎都是冯云山在紫荆山地区多年传播“拜上帝教”,

① 《曾国藩全集·奏稿》(一),第61页。

② 王定安《湘军记》,第15页,岳麓书社1983年版。

③ 同上,第12页。

④ 《曾国藩全集·日记》(一),第391页。

⑤ 《清史稿》·《列传》卷45。

⑥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74页。

⑦ 《薛福成选集》,第213-215页。

“历山河之险阻,尝风雨之艰难”<sup>①</sup>的过程中识拔出来的。在对人才的重视和延揽上,冯云山看来也是很有见识和切实措施的,可惜他过早地去世了。而洪秀全在这方面则显然不及冯云山。即使对于冯云山识拔出来的这批杰出人才,除了肖朝贵也与冯云山一样早亡,姑可不论外,洪秀全多半也不善于很好团结他们,以至这些人之间以及他们与洪秀全之间的矛盾未能妥善解决,终于或死于惨烈的内讧火拼,或私自出走不归。天京变乱的有关人员各有自己应负的责任,但作为太平天国最高领导人和变乱的直接关系人,洪秀全是有不可推卸之责的。天京变乱其他方面的问题非本文议论范围,但就从中反映的洪秀全对人才的凝聚、团结——这些也是是否重视人才的表现——而言,它有力地说明了洪秀全之远逊于曾国藩。曾国藩在人才问题上也有过多次失误,例如1855年塔齐布在九江军营中亡故,曾国藩命周凤山代统其军,结果证明是任用不当的,因为周凤山才能平平,且为人骄矜,“弗戢其下,战辄乱行”,“三溃军三夺官”;<sup>②</sup>李元度跟随曾国藩多年,曾国藩认为李虽不善带兵,“然亦有百折不回之气”,“肝胆照人,始终可感”,但他虽保荐了許多人,却没有李元度,自己亦觉“独惭无以对渠”,<sup>③</sup>到1860年秋,李元度终于擅自离开皖南(曾氏时在皖南)去浙江、江西等地另投他人,曾国藩为此愤恨多日。这类失误,曾国藩常有,但这与洪秀全的失误终究不能等量齐观的。

天京变乱后洪秀全于1857—1858年间重组太平天国领导核心,除他本人外,其成员有蒙得恩、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韦俊等人。这些人除了蒙得恩外,确都是能征善战、富有军事才干的。不过,他们都已是久经沙场、当时正指挥着千军万马的高级将领,他们被提升进领导核心主持军事,已是顺理成章的事,这与曾国藩从中下级官佐或普通士子中识拔塔齐布、杨载福、彭玉麟等人,是不同

的另一回事。而且在他们履任重职后,洪秀全也没有积极团结他们。他们的封王,都要到1859年洪仁玕无功受禄后为平息将领们的不满才实施;其中李秀成更是在消除了由李昭寿劝降信引起的轩然大波之后才封予“忠”王,带有明显的安抚性质。而到1861年安庆失守后,洪秀全又撤了洪仁玕、陈玉成的职,重新起用其贪鄙无能的二位哥哥主朝政,从此一发不可收地任人唯亲了。

洪秀全对洪仁玕的提拔倒真是很破格的。洪仁玕有令人崇敬的高尚品德,又是那时少数几位富有世界知识的中国人之一。但令人十分惋惜的是并无治国、打仗等方面的经验,并未立过多少功劳,所以他虽骤膺大任,却并未作出有裨实际的政绩。他的被破格提拔,反而引起李秀成等宿将们的不满。

最能说明曾国藩与洪秀全在对待人才上的不同态度和成败的,也许莫过于容闳的事例了。容闳从美国留学毕业回国后,满怀让“西学东渐”以振兴祖国的强烈愿望,于1860年11月来到天京,19日拜会了洪仁玕,提出请太平天国建立一支良好军队、一个良好政府以及设立银行、学校等七条建议。洪仁玕对此很感兴趣。但过了几天他却婉拒了容闳的七条建议。容闳便于12月24日离开了天京。临行之前,容闳再次向洪仁玕表示:如以后太平天国决定采纳其议,他仍愿随时前来效力。

由于容闳没有提到,也无别的材料证明,因而我们难以肯定在他逗留天京的这一个多月里,洪仁玕有否向洪秀全汇报过容闳的来到及其所提的建议。但我们知道容闳与洪仁玕早在香港时便已互相认识,容闳现在又是留美毕业回国的特殊人物,他在天京逗留时

① 《天情道理书》,《太平天国印书》(下),第522页,江苏人民出版社。

② 王定安《湘军记》,第53—55页。

③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374页。

间长达一个多月,其建议深受洪仁玕的赞赏,太平天国那时又极缺治国经邦之人才,以及容闳临行仍对洪仁玕作上述表示和他以后在所著《西学东渐记》中仍高度评价洪仁玕,凡此种种都使我们有理由认为洪仁玕是在向洪秀全汇报之后,才委婉地向容闳转达了洪秀全拒纳其议的意见的;至少洪秀全对于近在身旁的这位不可多得的人才连一次也未召见过,是完全可以肯定的。

容闳是一位伟大的爱国志士,他极其痛恨清朝的腐朽、反动统治,强烈同情太平天国。他为自己振兴中国的抱负无处实行而痛心,离开天京后便投身商贸活动。正当他一心经商之际,突然收到了来自安庆的朋友之信,邀他前往曾国藩在安庆的军营。接着又收到另几位朋友之信,作出了同样的邀请。容闳怀着疑虑曾国藩会因他曾投奔天京而将加罪于他的心情前往安庆,到后方知:原来曾国藩听到幕僚们介绍容闳的情况后,几个月里无日不思一见。容闳一到,曾国藩便立即亲自加以接见,不仅对他敬礼有加,还主动征询、虚心采纳其兴国良策。对于容闳提出的向国外采购机器设备、开办机器制造厂的建议欣然接受,而当即委托容闳主持其事。后来他还大力支持容闳派少年儿童留学美国的建议。容闳从亲身经历中,对曾国藩产生由衷的崇敬之心,极言称颂曾氏“一生之政绩,实无一污点”,“其才大而谦,气宏而凝,可称完全之真君子,而为清代第一流人物”等

等。<sup>①</sup>而我们须知他在讲这些由衷之言时,仍是极其痛恨清朝、同情太平天国的!

容闳主动跑到天京条陈振兴中华、振兴太平天国的大计而未受洪秀全重视,未被采纳;他满怀热情而去,怏怏不乐而离。曾国藩则再三邀容闳前往一见,主动征询计策,对他言听计从;容闳惴惴不安而去,欣然受命而离。——洪秀全与曾国藩对待人才的态度形成多么强烈的反差!所以有人认为“曾国藩能成大事,亦即由于其幕府宾僚之群策群力互助建功也”,<sup>②</sup>是言之有理的,容闳的事例就是一个明证。

中国近代史上那场遍及大半个中国的惨酷大搏斗已经过去一百多年了,太平天国英烈们留下的无数可歌可泣的奋斗事迹,迄今仍令我们为之肃然起敬;曾国藩为保卫一个早该被埋葬的王朝和垂死的封建专制制度而血腥镇压太平天国,其罪责不容洗刷。但不论我们对曾国藩作何评价,不能不承认他几十年一贯大力重才、招才、育才的认识和行动,是远比洪秀全高明的;湘军的崛起和太平天国的最终失败,都是与此密切有关的。

(作者:杭州大学历史系教授;  
责任编辑:周武)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71页。

② 《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第2页。

(上接第74页)

“二·九”惨案发生后,2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由周恩来起草的关于蒋管区工作的指示斗争中要联系到,有时要转移到经济斗争上去,才能动员广大群众参加,而且易于取得合法形式。有了经济斗争的广大基础,也易于联系到反特务反内战的斗争上去”。<sup>①</sup>这为“二·九”斗争指明了方向。也为今后地下党的工作避免了不必要的挫折。

“抵制美货”运动虽然没有开展起来,但是,“二·九”斗争的意义是不能低估的。它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勾结美帝,发动内战,镇压人民革命运动的罪行。教育了人民,提高了认识。

(责任编辑:张培德)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第723页。